



TITLE:

"學術與地域、國家和社會的關係" 討論意見

AUTHOR(S):

王, 楠

CITATION:

王, 楠. "學術與地域、國家和社會的關係" 討論意見. 2015年度京都大学
南京大学社会学人類学若手ワークショップ 東アジア若手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者ワークショップ報告論文集 2016: 198-200

ISSUE DATE:

2016-06-04

URL:

<http://hdl.handle.net/2433/215771>

RIGHT:

討論意見

王 楠 (WANG Nan) *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想先講一件“小事”：

去年8月，我加入了一個中國現代史研究者組成的聊天群。某日討論二戰問題時，我表示反對美國當年投擲原子彈的錯誤行為。此言一出，即有兩位學界同人出面，指責我既昧于歷史事實，也有辱戰爭受害國國民的立場。因為是小字輩，我當時只堅持說我的觀點並無問題。其實，我很想反問他們一句：在原爆問題上，你們是否喪失了作為“人”的立場？

它讓我想起了捷克猶太裔女作家海達·科瓦莉 (Heda Kovály) 的經歷。1945年，剛從集中營逃出不久的海達，在後方給一位瀕死的德國士兵送水喝時，立即遭到同胞責罵：“要不是知道你在集中營被關過，我一定會叫你為此付出代價的……讓德國人見鬼去吧！”這責罵讓海達感到恐懼，她說：“這使我看到戰爭是怎樣深深地腐蝕了人們。它就像刀子般地砍下來，將民族分隔開來。這道傷疤，要經過很久的時間才能夠癒合。”¹

很久會是多久？在東亞地區，這個問題目前似乎無解。雖然飽受二戰折磨的親歷者差不多都已經離開人世了，但是藉助記憶，民族衝突的傷疤依然刻在戰後世代身上，不時被撕開展示，有時甚至成為某個群體“漠視別人痛苦經歷的屏障”，讓他們喪失了對“人”的基本關懷，可當初戰爭暴行的發生，不正是起於對他者的“去人性化”嗎？此種缺失的影響不僅存在於國與國之間，也存在於民族的內部。我始終難以忘記，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赤裸裸的白骨坑前，幾位少年的嬉鬧聲。他們並不是不知道南京大屠殺，也許一轉身，他們就能在鍵盤上敲下對大屠殺的感懷，然而他們對真實的創傷一無所知——顯然紀念館也沒有起到教導的責任。

這種局面的癥結是什麼呢？我很讚同中山先生的觀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家”、“民族”的框架限制了人們的認知，這在中國大陸非常典型。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說，“如果不想讓對過去的回憶成為當代的掘墓人”，人們“必須知道什麼知道該遺忘，什麼時候該記憶，並本能地看到什麼時候該歷史地感覺，什麼時候該非歷史地感覺。”²可是，在中國大陸，從戰後到現在，如何記憶與遺忘一直都受制於國家的政治需求，人性的本能很難受到尊重。典型如南京大屠殺問題，上世紀中日交好時期，中國政府做出了和解的決定，並且確立了一種詭異的邏輯——把遺忘當成寬恕。結果，大屠殺倖存者被迫噤聲，個人索賠行動也遭到各種阻撓。李秀英是最有名的大屠殺倖存者，她的受害經歷現在已為社會大眾所熟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生活艱難的她曾在向政府求助無門時，心痛地問：“為什麼中國人跟人家一好了，以前的事就不提了？我給人家打傷了，卻一輩子沒有人管我。”1990年代初，政府曾派人去李秀英家拍攝錄像，讓李秀英對著鏡頭說：“現在中日已經友好了，過去的恩怨就算了。我們不再過分計較歷史問題。”等這些人走後，李秀英連說不服氣，她說，“戰爭不要賠償的話，是他們說的”，“他們說這話的時候又沒有來問我，我傷了也沒有人來管我。為什麼要我說戰爭不要賠償？為什麼不提？”第二天接受採訪時，李秀英說出了自己的真實想法，攝像的人雖然沒有打斷她講話，但關掉了攝像機。據說，這段錄像原本要用於某

* 中國·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

¹ 科瓦莉：《寒星下的布拉格 1941-1968》，張芸譯，花城出版社，2014年，第51頁。

² 弗裡德里希·尼采：《歷史的用途與濫用》，陳濤，周輝榮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頁。

國際人權會議的³。

現在，局面似乎反轉了，中國政府開始積極推進保存戰爭受害記憶的項目，但也把過量的歷史推到了政治的前臺；而在另一方面，把記憶的喚起完全當成政治行為，視遺忘為和解之道的詭異邏輯，也為日本修正主義者所持。離戰爭結束愈來愈遠的時代，反而愈發為民族衝突的幽靈所滲透。尼采說，過量的歷史，不僅會讓生活殘損退化，還會讓歷史緊隨其後退化，目前的情況似乎正是如此，不能不令人感到擔憂。所以我很讚賞中山先生提出的逾越二十世紀框架的設想，在對戰爭記憶的研究中，我也直觀感受到將“人”作為主語，突出個人生命史的重要意義。

不過，對於中山先生建議的另一個主語“地域”，我略有些疑惑。首先，我讚同陳威璠先生的觀點，“地域”的範圍是難以界定的，而且關於地域的想像與民族國家的想像無法分割。其次，我想中山先生提出“地域”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去民族國家化。不過，民族國家的主導地位似乎在未來很長時間內都很難改變，讓人們從指定不明的“地域”出發，進行思考，是有難度的。我想是否可以退一步說，雖然民族國家的界線仍然印在人們的腦中，但能否努力盡力排除政治利用，淡化這些界線的政治色彩，將排他性的一面改成包容性的一面？從“人”的角度出發，或許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再次，民族認同或許在人們的責任認知上是一點積極效應的。很明顯，德國人的生活就受到了奧斯維辛遺產的深刻影響。對此，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有一個絕妙的比喻，他說“德國人的記憶就像一條巨大的舌頭，一遍遍地舔舐，想要找出那顆隱隱作痛的壞牙”⁴。是什麼驅動這條舌頭一直舔舐呢？我想德國人的民族認同引發的責任感肯定起到了作用。高橋哲哉說戰後出生的日本人，是沒有“戰爭責任”的，但是他們有“戰後責任”。雖然高橋先生強調在應答可能性的責任方面是不存在國境的，但這種“戰爭記憶責任”還是針對“日本人”這一共同體提出的。此外，說到拒絕國家，在戰後德國確有這樣的趨勢，學者對此普遍持認可態度，但是這一趨勢延續至今，也有其負面效果：在德國，如果不加特別注釋，人們時常會將“過去”單純理解為納粹的過去，結果，德國“歷史中留下的除了造成忘卻的記憶源泉外別無他物”⁵，這不也是一種嚴重的損失嗎？

關於第二個問題，日本政府裁減人文社會科學規模的政策在中國大陸也產生了反響，《澎湃新聞》當時擬的新聞標題是：“人文學科陷入又一輪衰退？其實從來都很尷尬”。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日本的裁減政策並沒有釋放一個全新的信號，20世紀以來，人文學科的危機已經發生了不止一次了。彼得·諾維克（Peter Novick）提到，一戰之後，美國職業歷史學家的前景變得非常暗淡，他們把中小學教育的地盤讓給了教育從業者，又把廣大的公眾讀者讓給了業餘歷史學者，學術上也難有進展——那時人文學者的境遇要比現在糟糕的多。“告訴我，爸爸，歷史有什麼用？”同一時期，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則因其幼子的發問寫出了《歷史學家的技藝》一書，嘗試為被質疑“無用”的歷史學家辯護。不過，雖然布洛赫在何為有用這一點上和普通市民有分歧，但是他很清楚地認識到，“如果一門科學最終不能以某種方式改善我們的生活，就會在人們眼中顯得不那麼完美……史學的主題就是人類本身及其

³ 田川、林平芳編著：《尋找英雄 抗日戰爭之民間調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47-250頁。

⁴ 伊恩·布魯瑪：《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倪韜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4頁。

⁵ 阿萊德·阿斯曼：《記憶中的歷史：從個人經歷到公共體現》，袁斯喬譯，南京大學出版社，待出。

行為，歷史研究的最終目的顯然在於增進人類的利益”⁶。也即，人文學科肯定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角色，所以我讚同中山老師的觀點，學者不能不關心社會的利害，不論從何種角度來看，都必要接近大眾社會關心的問題。

至於是否可以考慮從市民社會獲取研究的支援，我想這一點，中國大陸的情況可能和日本、台灣的情況很不一樣。在大陸，文科學者的絕大多數研究經費都來自國家。過去有不少學者出於各種考慮，不去申請科研項目，在沒有經費的情況下或可以勉力維持，但在目前的職稱評定體系下，無論你是否需要經費，都必須申請國家的研究項目，否則無法升等，而這類項目的課題選擇範圍是有限的。企業對文科的支援首先是很少，其次他們的支援也要受到官方機構的審核，因此仍然不能保證學者的研究自由。可以想見，在中國大陸，國家將在未來很長時間內都是學術研究的最大支援者，也是權限最高的管理者，變化可能存在於管控的程度如何。至於與市民社會的溝通，我覺得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我用了好幾年的微博，發現這幾年來，微博的輿論風向變化很大，盲從性更甚從前，而且愛國派已經穩占上風。陳威璿先生應該知道周子瑜事件，台灣人現在都見識到大陸網友的“戰鬥力”了——僅僅是被一個把“愛國”當生意做的演員挑撥了一下，就群情激奮，翻牆叫罵而不知恥。市民社會的這種生態當然是與政治環境是相互關聯的，在目前局面下，學者如果想影響市民社會，可能會受到兩方面的限制，但並非不可能，我也認識個別社會責任感很強的學者，努力在用自己的研究影響社會的認識，以及政府的規劃，還有些學者嘗試充分利用新興的社交媒體傳播更貼近民眾的人文知識。前路也許艱辛，但不可不為，我想這就是學者的良心吧。

（學力有限，談的非常簡單，請其他與會者多多指教！）

⁶ 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張和聲，程鬱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12頁。